

从3本他传看英语世界的“纪伯伦形象”转变

马 征

1883年1月6日，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Gibran Kahlil Gibran, 1883-1931）出生于黎巴嫩北部小乡村贝什里(Besharri)，他12岁随家人移民波士顿，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美国渡过，是一位画家、用英语和阿拉伯语进行创作的双语作家。作为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纪伯伦的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有比较广泛的读者群，并且引起相当大的反响。

在美国，纪伯伦的文学作品从他在世时就赢得了批评界和大众读者的广泛关注。他最早的两部英文著作《疯人》（*Madman*, 1918）和《先行者》（*Forunner*, 1920）一出版就得到了美国批评界的青睐，一些著名文学杂志及报纸，譬如《太阳报》（*Sun*）、《呼喊》（*Call*）、《邮报晚报》（*Evening Post*）、《日晷》（*Dial*）、以及哈丽亚特·门罗（*Harriet Monroe*）的《诗刊》（*Poetry*）纷纷撰文评论。1923年，由美国文学史上以扶植先锋艺术著称的“小杂志”类型的出版社克诺夫出版社（*Knopf*）出版纪伯伦的名作《先知》，虽然《先知》并没有像前两部英文作品一样，得到美国先锋艺术界的重视，却在普通大众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先知》在美国的销售量持续上升，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期间，美国经济大幅度滑坡，《先知》的销售量却骤增，1938年，美国《出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甚至因为“经济大萧条时期《先知》销售量为何反而剧增”这个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直至今日，纪伯伦的文学作品仍常被印成尺寸很小的“袋装书”（*pocket book*），被人们当作礼物馈赠给亲朋好友。

纪伯伦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广泛的读者群和深远的影响力，使他在英语读者中形成了特定的作家形象。事实上，在学术研究视域，作家形象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纵深的层面，这一形象可以为我们提供理解和诠释其所处文化的可能性。从接受反应的角度看，读者心目中的作家形象不仅体现了接受者的个体性差异，更彰显了接受者所处文化的独特性，不同的接受语境，会建构出迥然而

Jean Gibran ,and Kahlil Gibran ,*Kahlil Gibran, His Life and World*, New York: Interlink Books, 1998, pp. 326-8.

异的作家形象。本论文通过集中观照不同接受语境中的 3 本具有代表性的纪伯伦英文他传，深入分析不同的“纪伯伦形象”中映照的文化内涵。

大致来讲，英语世界“纪伯伦形象”的嬗变与纪伯伦研究的发展是同步的，英语世界的纪伯伦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早期纪伯伦研究和当代纪伯伦研究，早期纪伯伦研究指纪伯伦在世至 20 世纪上半叶的纪伯伦研究，这一时期纪伯伦形象的形成主要来源于报刊杂志对纪伯伦及其创作的述评性介绍，该时期由纪伯伦晚年私人秘书芭芭拉·杨（Barbara Young）完成的《此人来自黎巴嫩：哈利勒·纪伯伦研究》（*The Man is from Lebanon, A Study of Kahlil Gibran*，以下简称《此人来自黎巴嫩》）是英语世界第一部有影响力的纪伯伦传记作品，对早期纪伯伦形象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当代纪伯伦研究主要指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纪伯伦研究，这一时期纪伯伦形象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哈利勒·纪伯伦：他的生活和世界》（*Kahlil Gibran: His Life and World* 以下简称《他的生活和世界》）和《哈利勒·纪伯伦：人和诗人》（*Kahlil Gibran: Man and Poet* 以下简称《人和诗人》）是当代英语世界纪伯伦传记文学的两部代表作，《他的生活和世界》分别于 1981、1991 和 1998 年 3 次修订出版，《人和诗人》则在借鉴前一成果的基础上出版于 1998 年，是当代英语世界纪伯伦传记研究最重要的两项成果。总的来讲，当代两部纪伯伦传记作品显示出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这与早期传记作者以一位“西方人”的视角极力将纪伯伦“神秘化”的主观倾向形成了鲜明对照，这种写作立场的转变，使当代纪伯伦形象表现出更为“人性化”的特点。

—

《此人来自黎巴嫩》的作者芭芭拉·杨是一位不知名的作家，同时也是纪伯伦的崇拜者，1925—1931 年，她作为纪伯伦的私人秘书，协助病中的纪伯伦完成一些写作和社会工作，1931 年纪伯伦刚去世时，杨出版了一本关于纪伯伦生平的 45 页的小册子，1945 年，她又出版了《此人来自黎巴嫩》，这是英语世界第一部有影响力的纪伯伦传记资料，对早期英语世界纪伯伦形象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总的来讲，这部作品的显著特点是作者鲜明的主观感情色彩，杨在该作的“前言”中坦言自己不可能作到“完全客观”地写纪伯伦其人其作，反而是以纪伯

伦 7 年私人秘书的独特视角来感受纪伯伦，并毫不隐讳纪伯伦诗作给自己带来的强烈震撼力和对纪伯伦诗作和天赋的崇拜。因而，作者常以“亲历者”身份描述与纪伯伦一起经历的事件和自己的切身体会，感受性极强。例如作者从自己与纪伯伦的接触出发，评价纪伯伦更像一位孩子，回忆纪伯伦工作之余的率真、可爱和羞怯的孩子性情。

与早期纪伯伦传记作品中作者鲜明的主观立场不同，当代两部传记作品则表现出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两位作者都试图以客观、中立的学术视角介入写作，这与早期纪伯伦传记文学形成了鲜明对照。

《他的生活和世界》的作者是哈利勒·纪伯伦和简·纪伯伦夫妇（Jean Gibran and Kahlil Gibran），与传主同名的作者和纪伯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他的父母都是纪伯伦的表亲、并在 20 世纪 20 年代移民美国，作者 1922 年出生于少年纪伯伦曾居住过的移民聚居区，也在纪伯伦曾就读过的移民学校昆西中学（Quincy School）读书。虽然纪伯伦去世时作者还未满 10 岁，但当时已是画家和作家的纪伯伦的造访，给他的童年留下了温暖而又深刻的记忆。这种特殊的亲缘关系显然给作者进行纪伯伦传记的写作带来了既有益又不利的影 响，一方面，作者在童年时代亲身接触过纪伯伦，纪伯伦给他留下了直接的印象，由于这种特殊的亲缘关系，作者得以从纪伯伦的妹妹玛丽安娜及波士顿其他亲戚那里获得大量纪伯伦的物品、书信和口述资料，也就是说，作者得到了很多“活”的传记资料这自然给这本传记的“可靠性”加了分，但另一方面，这些“活”的传记资料也隐藏着诸多“不可靠”的因素——作者很容易从童年时代的记忆和亲戚的口述中获取“印象式”和带有情感色彩的回忆性资料。作者显然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在该作品的“介绍”中，作者叙述了促使他开始纪伯伦传记写作的直接原因，那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童年记忆和对纪伯伦这位在西方世界获得成功的美国第一代阿拉伯移民的身份认同感，而是因为自我发展的独立使他有可能客观、冷静地进行纪伯伦传记研究：

1966 年，我渡过了生命的困惑期。我在职业上获得承认，我获得了独立发展的空间、而不再局限于家族的狭窄圈子，父亲将（纪伯伦的）文章、书籍、书信和玛丽安娜的礼物委托给我。我有了自己的家庭，于是，评价这些纪伯伦物品的

Barbara Young, *This Man from Lebanon, a Study of Kahlil Gibra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5, "Foreword".
Barbara Young, *This Man from Lebanon, a Study of Kahlil Gibra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5, pp. 11-12.

时机到了。

显然，作者是以一个独立的研究者身份、而不是纪伯伦的仰慕者或者后辈的身份进行写作的，这使《他的生活和世界》表现出“研究型”传记文学特征——不同于普通的传记文学作品，该作采取了客观、严谨的学术立场，研究性的论述重于文学性的解读，不追求作品的可读性，却追求作品的历史真实性。就此而言《人和诗人》也堪称当代英语纪伯伦传记文学的另一部研究型力作。

《人和诗人》的第一作者苏黑尔·布什雷(Suheil Bushrui)是享誉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纪伯伦研究专家，他1930年出生于耶路撒冷的拿撒勒，自幼入阿拉伯学校读书，打下了良好的阿拉伯语言文化基础，后入英国学校读书，在南安普敦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获得英语文学的博士学位，早年主要从事叶芝(W.B. Yeats)研究，1968年，他任教于黎巴嫩贝鲁特的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开始从事纪伯伦研究并获得巨大成功。布什雷在西方和阿拉伯世界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他曾在英国、尼日利亚、加拿大、黎巴嫩和美国的大学任教，多次就“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关系”问题进行公开演讲，同时，他也是美国玛里兰大学“哈利勒·纪伯伦科研项目”(The Kahlil Gibran Research and Studies Project)的负责人，1999年，在该项目的组织和推动下，举办了第一次国际性的纪伯伦学术研究会议，迄今为止，布什雷共出版了包括纪伯伦的译作、传记、作品导读和研究性专著在内的6部作品。其中，《哈利勒·纪伯伦：生态诗人》(*Kahlil Gibran, Poet of Ecology*)是当代英语世界唯一的一部系统的纪伯伦研究专著，1998年出版的《人和诗人》是英语纪伯伦传记研究的最新成果，该书的学术视角是显而易见的，它和《他的生活和世界》一样表现出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这与早期传记文学作者芭芭拉·杨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形成了鲜明对照，从而也使当代纪伯伦形象发生了“质”的转变。

由于作者立场的不同，两个时期传记作品中的纪伯伦形象存在着显著差异。芭芭拉·杨鲜明的感情色彩使《此人来自黎巴嫩》具备了其它两部传记作品所不具备的优点：直观性和感受性强。由于直接参与了纪伯伦的晚年生活和创作，作者对纪伯伦作品中精神实质的把握和理解是到位的，作者以自己与纪伯伦交往的亲身经历描述了一个日常生活中的纪伯伦。但鲜明的主观感情色彩也使这部作品

Kahlil Gibran and Jean Gibran, *Kahlil Gibran: His Life and World*, New York: Interlink Books, 1998, p.2.

极富文学“创造性”：纪伯伦的私人秘书和崇拜者身份使作品充斥了作者不厌其烦的赞誉之辞，纪伯伦其人更被描绘成一位充满神秘色彩的先知。作者称纪伯伦为“天才”、他“来自圣经的土地”、“与神圣相联”，并以颇富传奇色彩的事例描述纪伯伦自4岁就表现出的绘画和写作的艺术天赋和神授气质，而成年后的纪伯伦更是像所有“天才”一样，从不为读者创作，甚至纪伯伦的内敛性格也被涂上超脱尘俗的神秘色彩。将纪伯伦“神秘化”的倾向导致了作品中诸多材料的失实，譬如称纪伯伦在20岁以前的大部分时间在黎巴嫩渡过并故意美化纪伯伦的家庭出身等等，以突出纪伯伦“神秘的”东方身份。

与早期传记文学不同，客观、中立的作者立场使当代两部传记作品中的纪伯伦形象发生了“人性化”的转变。《他的生活和世界》有计划、针对性地从纪伯伦的美国友人玛丽·哈斯凯尔(Mary Haskell)、弗雷德·霍兰德·戴伊(Fred Holland Day)、约瑟芬·皮勃迪(Josephine Peabody)处获得了书信、日记、实物等大量第一手资料，对纪伯伦的生活和创作经历进行详实、生动的呈现，使读者如临其境。《人和诗人》则在现实层面梳理纪伯伦及其创作与美国文化的关系基础上，进一步从宗教、文化的高度探讨纪伯伦在其创作中试图调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种种尝试，展现了一个“人和诗人”的纪伯伦形象。在这两部传记作品中，纪伯伦不再是《此人来自黎巴嫩》中赋有神授气质的天才而是一位12岁背井离乡、自小生活在美国社会底层、具有强烈成功欲望和奋斗精神的第一代阿拉伯移民形象。两部作品忠实记录了少年纪伯伦如何在波士顿“先锋派”艺术家戴伊的引荐下初涉艺术圈，玛丽对纪伯伦艺术创作进行的物质资助和英语语言训练等事实。对于早期传记作品中极力将纪伯伦的家庭和东方身份“神秘化”的倾向，当代传记作品也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纪伯伦父亲的渎职入狱、家庭的被迫迁居美国、在波士顿移民聚居区的困窘这些“不名誉”的纪伯伦生平，作品都照实叙说。

总之，当代两部传记作品打破了将纪伯伦“神秘化”的倾向，力图以客观、中立的视角还原一个真实而富有“人性”的纪伯伦，是纪伯伦传记文学的一大突破，而两个时期传记作品中纪伯伦形象的转变并非偶然现象，它们在各自所处的时代均具有代表性。《此人来自黎巴嫩》与当时美国报刊杂志述评中塑造的纪伯伦形象一致，早期美国报刊杂志述评往往突出纪伯伦及其创作“神秘的”异

Barbara Young, *This Man from Lebanon, a Study of Kahlil Gibra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5, pp.4-12.
Barbara Young, *This Man from Lebanon, a Study of Kahlil Gibra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5, p.31.

域东方色彩。譬如《太阳报》发表评论，认为纪伯伦的作品给予“我们”西方世界的东西，几乎不能在“我们”自己诗人的创作中找到。《诗刊》评论《先知》带着些“叙利亚哲学”的味道，它异于“我们的”文化，我们这一代不安和不满足的灵魂，能够从中找到一种“奇妙的”放松。一些报刊杂志甚至将纪伯伦描述成一位身穿阿拉伯长袍、出身阿拉伯名门望族的先知。当代两部传记作品中的纪伯伦形象也与当代纪伯伦研究的发展趋势相吻合。以苏黑尔·布什雷为首的“哈利勒·纪伯伦科研项目”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了当代英语世界纪伯伦研究的发展趋势，1999年，在“哈利勒·纪伯伦科研项目”的组织和推动下，举行了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国际性的纪伯伦学术研究会议，来自美国、英国、黎巴嫩、法国、中国等国家的纪伯伦研究专家和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学者围绕着“通向文化和平”、“哈利勒·纪伯伦的遗产”、“诗人的形象”、“幻象和伦理的统一”、“人权诗人”和“美国本土视角的移民传统”等论题，以客观严谨的学术态度对纪伯伦其人其作进行了文化层面的深入探讨。

显然，两个时期传记文学中纪伯伦形象的转型，体现了早期纪伯伦述评和当代纪伯伦研究中纪伯伦形象的转变，具有代表性，那么，英语世界的纪伯伦形象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呢？它又映照出什么样的文化内涵呢？

二

两个时期纪伯伦形象的转型，体现了20世纪美国文化由“西方中心主义”向“多元文化主义”的转变。首先是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接受了由欧洲舶来的“东方想象”，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纪伯伦的“东方”身份、自幼年表现出的绘画天赋和忧郁早熟气质，使早期美国评论界和传记作者将纪伯伦看作一位富有神秘色彩的东方先知。而当代美国多元文化景观中少数族裔群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文化对话的需要，使当代纪伯伦研究和传记文学中的纪伯伦形象发生了“人性化”的转变——他是早期阿拉伯移民中的佼佼者，在创作中力图融汇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架起沟通的桥梁。

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批评界以猎奇心理看待纪伯伦文学创作中神秘的“东方”色彩，与欧洲浪漫主义以降的“东方想象”有关。自19世纪上半叶的

Jean Gibran and Kahlil Gibran, *Kahlil Gibran, His Life and World*, New York: Interlink Books, 1998, p. 326, p. 372.

浪漫主义时代以来，“东方”作为西方的他者形象，一方面被视为落后愚昧的，另一方面，却在文学艺术领域被想象成具有“异国情调的、神秘的、深奥的、含蓄的”。萨义德写道：“欧洲通过亚洲获得新生”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浪漫主义观念在一些西方人的心目中，“东方”作为“西方”的对立面，可以挫败西方文化的物质主义和机械主义，从这一挫败中将复活、再生出一个新的欧洲。欧洲的这——“东方想象”极大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与欧洲文化特殊的亲缘关系，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在特定历史时期构建新的“边疆神话”的内在需要。

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影响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背景是美国边疆的消失。1893年，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在芝加哥的美国历史学会会议上宣读论文《论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该论文是19世纪关于西部的最有影响的一篇文章，特纳在这篇论文中提出的“边疆学说”彻底改变了美国的编史工作，其影响波及经济学、社会学、文学评论及政治等领域。

特纳认为，边疆是“野蛮与文明之间的汇合点”，是一片“自由土地”，在边疆一带每当文明与野蛮相接触，自由土地总是不断向人类及其社会施加再生、更新、恢复活力的影响。在特纳看来，边疆的自由土地是“一眼神奇的青春之泉，美国始终沐浴于其中，并不断恢复活力”。但19世纪末期向美国人宣告了边疆的结束，1890年，美国人口调查局宣布：“现在未开发的土地大多已被各个各自为政的定居者所占领，所以不能说有边境地带（frontier line）了”。边疆的消失影响了19世纪末期乃至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文学。

在美国文化中，“边疆”（frontier）是一个富有独特内涵的概念，边疆的消失意味着美国人“西部想象”的结束。在美国人心目中，边疆代表了未受文明侵蚀的大自然，是自由和个人主义的象征，是一片未被开发的“处女地”，人们在此寻求冒险、逃避、或者反抗。因此，在19世纪末期以来的美国文学中，出现了制造“新边疆”的现象。弗雷德·刘易斯·帕提（Fred Lewis Pattee）在分析19—20世纪之交的文学现象时写道：伴随着边疆的消失，杰克·伦敦和这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49页。

[美]亨利·纳什·史密斯《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薛藩康、费翰章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56页。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引自潘绍中编著《美国文化与文学选集（1607—1914）》，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505—507页。

个时代的其他作家试图在阿拉斯加、甚至是太平洋的所罗门岛制造一个新的边疆^{〔1〕}。同样，边疆的消失也为美国接受欧洲浪漫主义以降的“东方想象”提供了契机。而对于大多数西方人来讲，“来自叙利亚”则赋予了纪伯伦的身份某种神秘色彩：那里是《圣经》中讲述的产生先知的神奇土地，是“物质化”西方的救赎之地。纪伯伦的艺术天赋和忧郁早熟的气质，进一步刺激了这一想象，于是使早期美国评论界和传记文学中的纪伯伦成了一位“来自东方的神秘先知”，他充满“异域东方色彩”的作品能使那一代美国人“不安和不满足的灵魂”得到“奇妙的放松”。

当代纪伯伦形象的转变体现了当代多元文化景观中边缘群体自我意识的觉醒。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文化的核心特征，是“各种抗议都打着被压制的多元性的名义，反对占有压倒性的同一性”。^{〔12〕}也就是说，是以多元主义的声音，消解“宏大叙事”、抵制本质化。表现在社会政治文化中，是边缘性别和少数族裔的觉醒，这构成了20世纪中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于是，大量一直以来被主流学界所忽略、掩盖的性别和族裔文本被挖掘出来、或得以被重新审视。^{〔13〕}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大学美国文学课程改革中，一些长期被排斥在美国文学经典之外的次要文学，如黑人文学、口头文学、少数族裔文学重新得到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重视。^{〔14〕}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作为第一位在美国享有声誉的20世纪阿拉伯作家，纪伯伦及其创作得以被重新挖掘和阐释，纪伯伦形象也由此发生了转变。在1988年美国第一部阿拉伯裔美国作家作品集《葡萄叶——百年阿拉伯裔美国诗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是当代多元文化时代中阿拉伯裔美国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促成了该书的成集：

美国的每一个少数族裔团体都有他自己的诗集：黑人、墨西哥人、犹太人、印第安人、中国人、亚美尼亚人等等。但到目前为止，却仍没有……阿拉伯裔美国作

〔1〕 Fred Lewis Pattee, *The New American Literature, 1890-1930*. New York: Cooper Square Publishers 1968. p.4.

〔12〕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38页。

〔13〕 王晓路等编著《当代西方文化批评读本》，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26页。

〔14〕 A. LaVonne Brown Ruoff and Jerry W. Ward, Jr. *Redefining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0, pp.63-4.

〔15〕 Gregory Orfalea and Sharif Elmusa, *Grape Leaves—A Century of Arab American Poetry*,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1988, p.3.

家的诗集。⁽¹⁵⁾

在这部诗集中，纪伯伦的身份是阿拉伯裔美国文学的奠基者，这与当代传记作品中纪伯伦形象的转变是一致的：不像早期美国批评界从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出发，将纪伯伦看作一位神秘的东方先知，却更侧重纪伯伦“人性”的一面，关注纪伯伦作为早期阿拉伯移民的心路历程和奋斗史。这种转变也表现在当代纪伯伦研究主体的身份改变上，早期的纪伯伦评论者多来自美国主流批评界，譬如《此人来自黎巴嫩》的作者芭芭拉·杨虽然是纪伯伦的私人秘书和崇拜者，但她的崇敬却显然出自一位“西方人”对纪伯伦及其创作中“东方特质”的猎奇心理。而当代美国的纪伯伦研究者却多为生活在西方世界的阿拉伯人，譬如当代两部传记文学的作者都是生活在“跨文化”地带的阿拉伯学者，他们更倾向于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角度关注纪伯伦的文学创作。